

人类文明的圣殿

北京

(下)

王光镐◎著

一座令人魂牵梦绕的城

一段让人无法释怀的追忆

没有一座城市

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

没有一段历史

这样激情澎湃又深邃神秘



首部全面纵向剖析北京历史文化本质属性的坚实力作
首部大视角横向比较北京历史文化特异性的扛鼎之作

这是关于“天下第一城”的全景史话
一门博大精深的“北京学”横空出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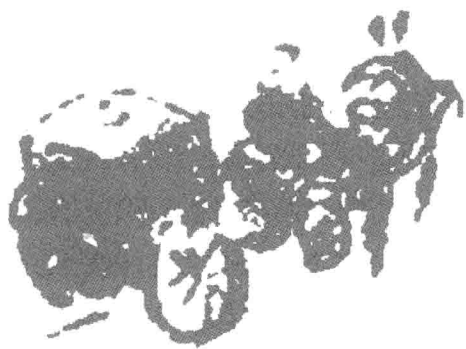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人类文明的圣殿 北京

(下)

王光镐◎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 / 王光镐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068-4281-5

I. ①人… II. ①王… III. ①文化史—研究—北京市

IV. ①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4785号

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

王光镐 著



策划编辑 安玉霞

责任编辑 刘 路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中尚图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总编室) (010) 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712 千字

印 张 54.25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281-5

定 价 86.00 元(全两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六章 一统性

——从多元一体到多元一统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学开山祖师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概念。他说：“我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①在这段话里，“多元”是指中国疆域内的五十多个民族，“一体”是指这些民族统属一个中华民族。案中华民族的核心，源起于西汉以来形成的汉族，汉族的核心则源起于先秦时期的华夏族。而据第二章第三节所论，华夏族最初是由黄帝时代的北狄、西羌、东夷、中原四大集团融会而成的，因此“多元一体”格局的最早形成，可以一直追溯到黄帝时代。然而，黄帝时代虽然有了最初的“多元一体”，但与后世大一统王朝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关键之处就在于黄帝时代的多元部分还处在各自为政的状态，史称“万国”或“万邦”。

《周易·比卦》：“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尚书·尧典》：“协和万邦。”《尚书·益稷》：“烝民乃粒，万邦作乂。”《战国策·赵策二》：“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墨子·非攻下》：“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史记·封禅书》：“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 4 期。

者万国。”《战国策·齐策》：“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以上所谓的“国”，即远古时期的方国或邦国，亦可称“氏”，如夏代的有扈氏、有易氏、有穷氏等。又可称方，如殷商卜辞的鬼方、犬方、土方等。上述“万国万邦”云云，无非极言其多，难以指实，但却道出了黄帝至夏禹时众多部族各自为政的状况。

夏以后，随着部族的融合与兼并，邦国的个体越来越大，邦国的数量越来越少。《逸周书·殷祝》：“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战国策·齐策》：“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吕氏春秋·用民》：“至于（商）汤而三千余国。”《逸周书·世俘解》：武王克商“遂征四方，凡憇国九十有九，……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礼记·王制》：周时“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尚书大传·洛诰》：“天下诸侯之悉来进受命于周而退见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诸侯。”《史记·陈杞世家》：“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汉书·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汉书·贾山传》：“昔者，周盖千八百国。”综合上述，商汤时尚有方国三千，西周初年仍有诸侯千八百。按照当时的地域概念，这些邦国其实都集中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即使加上四夷所在的北狄、东夷、西戎、南蛮，也只占当今中国版图很小一部分，密度之大不难想见。

“万邦林立”的实质在于，当时不仅邦族的数量多、密度大，而且皆有独立的国体和政体，是各自为政的人们共同体。《尚书·酒诰》云：“在昔殷先哲王……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这里说的是商代的情况，其政体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外服的侯甸男卫邦伯，一部分是内服的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并百姓里居。关于夏商时期的“五服”制度和“内外服”制度，已见前面第一章所述。要言之，内服是指夏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域，主要是京畿之地。所谓外服，则为诸侯国的所在，分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

几大类。这里的所谓“服”，即服从、服役之意，对“内服”的宗室贵族和各级臣僚来说，这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他们大多是夏商王室的同姓或异姓亲戚，服从王室是绝对的前提。而对于外服的异姓诸侯来说，这就要大打折扣了。例如商代历史上著名的虎方、鬼方、犬方、羌方、土方等，都曾是殷商的诸侯，但也都曾是殷商的劲敌，“时服时叛”即他们和“大邑商”的关系。姬姓周人也曾是殷商的诸侯，但最后灭亡了殷商的就是他们。

《诗经·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这首诗是称颂殷高宗武丁的，说当时“自彼氐羌”的各部族不敢不来进贡，不敢不来朝拜。但恰是这种称颂，反倒透露出夏商时期各方国与中心王朝并无君臣隶属关系，邦国的义务无非是定期向中原王朝纳贡和朝拜而已。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云：“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①王国维说夏商的天子只相当“盟主”，摆明了那时的政体只相当邦联。也就是说，当时各方国虽然结成了同盟，这个同盟虽然也有以中原王朝为首的宗主国，但它们仍然各自保有独立的主权。

即使只是邦联，也是相当松散的。武丁是商代中兴之王，适逢商王朝的鼎盛期，因此各诸侯国“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倘若赶上宗主国内忧外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史记·殷本纪》云：“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恰如此文所述，仅仅因为殷王室内部分争权夺利，诸侯国就不来朝拜，足见这个邦联是多么的松散了。史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中华书局，1959年。

侵暴乱，残伐不止”^①，凡此都是对邦联时代各邦国独自为政的真实描述。这种松散的邦联，是中国文明初兴阶段的一大特征，反映了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社会的松散性。

因此如第四章第一节所言，黄帝之时虽然有了庞大的部落联盟，但并无统一的王朝，黄帝的部族充其量不过是“万国”中较为强大的一个而已。但其“一体”的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即以黄帝时代言之，这时不仅有了联盟的实体，有了制约列国的共主，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共同的农业经济圈内，各部族还有了相当一致的文化。

据上章所述，早在史前时代，燕山南北的文化及中原文化就表现出了显著的一致性。又如第二章第三节所述，各地相当五帝时代的龙山文化更具有鲜明的共性，而这就是“万邦林立”的时代。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实际工作中，考古工作者向来更看重不同地域间文化的差异，因为藉此可以判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殊不知，站在全球的角度，或者以整个亚洲为参照系，便不难看出中华文化从史前时代起就表现出的一致性了。这个一致性可以说是相当的明显，充分表明了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在这个大的文化圈内，各部族已经有了相当接近的文化习俗和相当一致的心理素质，再加上共同的经济生活方式和共同的地域，这个“一体”的成分甚至大到了足以把他们涵盖为一个个体。

一方面是各自为政的多元实体，一方面又整合在一个共同的中心下，并在文化等方面保持相当的一致，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多元一体”。寻根溯源，自黄帝时代开始，这种状况便一直贯穿于“万邦林立”的五帝时代和推行“五服制度”、“内外服制度”的夏商两代。西周王朝实行的是诸侯分封制，这虽然有别于夏商体制，但其一仍旧贯的是，各列国依然保有相对独立的国体和政体。在这之后，《汉书·地理志》载：“周室既衰，礼乐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从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即到了春秋时期，西周初年的千八百诸侯已被数十国所取代，后来又被战国的七雄所取代，最终归为秦的统一。

当各自为政的“万邦林立”演变为秦的金瓯一统后，当国体和政体都归于一个君主和一个政府后，神州大地又处于何种状况呢？相对于“多元一体”的概念，我们称其为“多元一统”。“多元”在这里仍指多个民族，“一统”则指政出一门的统一实体。天下一统还只是其外在的表现，而内在的，则是某个主流文化的一以贯之，这才是更为重要的“一统”。

那么，从“多元一体”到“多元一统”，这种历史性的转变究竟开始于何时呢？毫无疑问，这种转折显然完成于大一统秦王朝的建立，但其开始却可以溯至西周的诸侯分封制，这由北京地区西周时期发生的变化便可一窥究竟。

一 历史性的转折

考古资料显示，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夏代后期已经越过了北京南部的拒马河，几乎踏进了一衣带水的中原文化圈^①。到了商代晚期，塔照二期文化分布在北京东部的平谷至北京西南的房山一带，典型遗存已深入到北京西南边缘的房山区塔照。至于商末周初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已南抵河北保定的大清河流域，再度向南扩张。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站稳了京津地区

^① 保定考古队：《河北省容城县白龙遗址试掘简报》，《文物春秋》1989年3期；《河北省安新县考古调查报告》，《文物春秋》1990年1期。

并把重心南移到今北京一带的畜牧族，势必还会饮马滹沱河、子牙河乃至漳河，继续向中原挺进。可以设想，一旦这变成现实，无险可依的华北大平原将沦为任马驰骋的疆场，北京也将永远成为与中原隔绝的“蛮夷化外”之地。

更令人惊诧的是，幽燕之地的“蛮族”居然还无视中原王朝的强大，在周人势力所向披靡之际，把自己的领地当成了商人残余势力的最后避难地，说已详第三章第五节。这表明，当时古燕地已游离于西周王朝之外，成为一股与中原分庭抗礼的力量。如果对此状况听之任之，或许北中国早在商周之际就会出现不同的政体，整个中国的历史也将因此而改写。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中原王朝该出手时就出手，做出了扭转乾坤之举。这个前所未有的战略举措，就来自创建伊始的姬周王朝。

第三章第四、五两节已述，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有天下后，很快便“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①，以武力为后盾强制推行了诸侯分封制。这种制度的基本内涵有二：一是受封者多为王室宗亲、姻亲与功臣，故曰“封建亲戚”；二是推行的范围很广，除京畿之外几乎遍及整个西周版图。

溯其源头，这种分封制似乎不迟于殷商时期已经实行。正如胡厚宣先生在《殷代封建制度考》一文中所说：“封建制度起源于何时，以真实文献之不足，难得而征之。然由卜辞观之，至少在殷高宗武丁之世。”^②但总体而言，“万邦林立”的各自为政局面乃是夏商时期的基本状况，当时各邦国的土地和民人是本身固有的，不像西周那样是因封建得来的，而那时所谓的“分封”，大多情况下只是给固有的部族加一个封号而已，实质上仍是邦联制。又如第一章所论，商王室直接控制的地方不过千里，并且这还只是商代的一千里，远比今天的千里为小。是故，殷商王朝即便在自己的辖区内分封诸侯，也断然不会像西周时期这样，分封的地域如此之广，分

①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② 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1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4年。

封的对象又如此之狭。

到了西周时期，王室的势力已足够强大，既可以凭借精锐的军团控制更为广袤的领土，也可以依靠不断强化的王权驾驭更多的贵族集团，这才有可能全面推行诸侯分封制。而正是西周王朝的这一创举，将此前多元一体但相对独立的各邦国纳入到多元一统的华夏体系中来，大大促进了古代中国的一体化进程。

也正是由于周人的诸侯分封制，幽燕的历史随之改写。

在周初的分封中，周王室在幽燕地区扶持了一个势力，又安插了一个势力。扶持的是“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①的蓟，安插的是“封召公奭于燕”^②的燕。前者是对先圣王后裔的褒封，发生在周武王时期；后者是对同宗贵戚的分封，始出于周成王之时。在北京平原上，它们一个位置居中，一个封地偏南，形成了南北分治的局面。

蓟、燕受封之前，北京地区流行的主要是张家园上层文化。这是一种以畜牧经济为主体的文化，上承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类型和塔照二期文化而来，年代集中在商代晚期到西周前期。及至燕、蓟受封之后，正如第三章所论，以房山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和顺义牛栏山蓟国贵族墓为代表，燕、蓟势力在北京地区迅速崛起，给畜牧族带来了强有力的反击。但考古现象揭示，开始的时候，燕、蓟两大文化还只是集中在北京平原的中心部位，周边不少地区仍为张家园上层文化所覆盖。这说明，畜牧族势力并不甘心退出北京平原，姬周势力与畜牧族势力的较量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综合以观，西周早期的北京地区，主要存在四大实体：一是初封的燕，二是固有的蓟，三是南下的畜牧族，四是北窜的商遗民。以上还是仅就北京的中心地段而言，此外若加上燕山河谷中东来西往的人群，各不同族系的存在更是不知凡几。西周初年北京地区的这种状况，在当时的西周版图

① 《礼记·乐记》。

② 《史记·周本纪》。

内是极具代表性和普遍性的，它表明，虽然西周王朝已经兴起，虽然分封制已经推行，但统一的局面并不因此而唾手可得，江山初奠的周人还要面对很多旧势力的挑战。

就燕地而言，初封的召公燕国首先遭遇的自然是畜牧族的反抗。西周初兴之际，恰好也是燕山南北畜牧族如日中天之时。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就是在这时进入游牧阶段的，燕山以南的畜牧族也毫不逊色，正以锐不可当之势向南挺进。对姬周集团来说，这无异于一场殊死较量，因为如果不将畜牧族彻底赶出北京平原，不仅姬周燕国贫无立锥之地，无险可依的西周王朝也难以自保。因此，西周王朝分封燕和褒封蓟的主要目的，恐怕就是寄希望于他们能“以蕃屏周”，把畜牧族驱赶到燕山以外。而无论册封时周王室是否有此意图，受封之后的燕和蓟也不得不把这个沉重的使命承担起来了。

燕和蓟显然完成了这个使命，否则西周历史上就不会有这两个诸侯国的存在。燕南的畜牧族在遭受了极大重创后，只得返回燕山以北的历史大本营，而这很可能就是辽河以西魏营子文化的重要来源。上章第四节曾述，魏营子文化集中在紧傍燕山北麓的内蒙古赤峰、通辽及辽宁的大小凌河流域，恰与北京平原一衣带水。此文化的一大特点是鲜有固定居址，却多有窖藏青铜器，且青铜器的来源各异，既有当地铸造的，也有不少中原形制的，是各地的“汇合体”。而据中原式铜器的铭文可知，它们中不乏自铭“匱（燕）”与“其（蓟）”者^①。根据以上情况，可以推测这些铜器中的相当部分是原居于燕山以南的畜牧族北窜时劫掠的，回到燕北老巢后作为宝藏就地掩埋下来。魏营子文化中还不乏中原式兵器，这更应该是畜牧族与燕、蓟交战时的战利品。

此前在讨论魏营子文化的中原式青铜器来源时，特别是在谈到其中镌

^① 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年6期。

有燕国铭文的铜器来源时，一般多认为这“说明燕国从一开始势力就延展到这样北的地方”^①，甚至断言西周初期的燕国已经“越过燕山到达辽西大凌河流域一带并在其河流两岸建有统治据点，控制华北到东北的出入孔道，范围已相当广大”^②。度诸情理，这个结论显然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在西周初年，甚至晚到西周中期，燕与辽宁喀左大凌河流域之间还隔着一个蓟国，更横亘着一个蒸蒸日上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游牧族，根本无法和燕国联成一体。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范围已如上章第四节所述，一般认为它的下限年代可以晚到战国早中期。这就是说，一直到战国中期以前，燕国的北界都未跨越燕山山脉。事实上，典型燕人墓葬在燕山以北的出现，也是晚到战国中期以后才有的事^③。此外，从更简单的道理说，西周初年的燕国立足未稳，都邑所在的北京小平原尚未统一，怎么可能一下子把疆域扩展到如此鞭长莫及的地方？所以最大的可能是，那些中原式青铜器是畜牧族北遁时劫掠去的战利品，只有极少一小部分或许出自燕或蓟的馈赠。

器物类型学的研究表明，魏营子文化的中原式青铜器少量属商代晚期，大多属西周早期，下限年代大体止于西周康王之时。第三章第五节曾述，召公燕国始封于成王，而成王及康王是西周王朝的鼎盛期，开创了“成康之治”。《史记·周本纪》云：“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里说的就是成康二世的河清海晏、天下大治。之所以魏营子文化的中原式青铜器基本止于康王之时，恰好说明在成王封召公于燕后，燕国于成康两世和盘踞在燕山南麓的畜牧族展开了生死较量。正因此，畜牧族的大规模北遁就发生在成康之世，被畜牧族劫掠到燕北的中原式青铜器也就基本止于康王之时。

① 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

② 徐自强：《关于北京先秦史的几个问题》，刊《燕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③ 郑君雷：《战国时期燕墓陶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3期。

然而，畜牧族武装是极其顽强也极为灵活的，燕、蓟两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康王之后的局部战争仍持续不断，一直蔓延到了西周中期。正如考古资料所揭示的，一直到西周中期，以畜牧族为主体的张家园上层文化才在北京地区消退干净。明显之例见于房山区镇江营，该遗址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就是在西周中期被周人的姬燕文化完全取代的^①。

周成王约当公元前 1042 年～前 1021 年^②，而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张家园上层文化的下限年代在公元前 930 年左右^③。这就是说，从成王始封召公燕国起，直到张家园上层文化彻底消失，前后经历了不下百年。这个过程是如此的漫长，足以说明这场较量是何等的残酷。在古代典籍中，召公以下的九世燕侯全部失载，有关西周早中期的燕国史实无处查寻。这恰好反映出，燕对畜牧族的战争备尝艰辛，甚至“几灭者数矣”^④，以至这个由召公始封的重要诸侯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暇他顾，完全淡出了中原舞台。

然而，发生过的总会留下痕迹，而其中的某些痕迹就保留在昌平白浮的西周中期墓中。事如第三章第四节所述，昌平白浮的三座西周中期墓是蓟国贵族的墓葬，其中 2、3 号墓是一对夫妇，各随葬了一套兵器。作为女性配偶的 2 号墓主不仅随葬了兵器，而且由出土的铜盔、兽面饰、腿甲等看，下葬时她还身着戎装。当时的蓟国就处在与畜牧族对峙的烽火第一线，2 号墓主尊为贵妇人依然披坚执锐，活生生地再现了燕、蓟和畜牧族战争的惨烈。

周室创基之初曾发生一件大事，即武王死后周公旦摄政，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不服，勾结商纣之子武庚禄父举兵反叛。周公被逼无奈，只

①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② 方诗铭编著：《中国历史纪年表》（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53 页。

③ 陈光：《北京市考古五十年》，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 年。

④ 《史记·燕召公世家》。

好兴师讨伐，结果周王师旗开得胜，“殷人大震溃，……王子禄父北奔”^①。第三章第五节曾述，在京津唐地区的张家园上层文化中，西周早期曾一度涌现大量商文化因素。商朝灭亡后居然出现大量商文化，岂非咄咄怪事？而揆诸史实，这恰与亡命的武庚禄父向北逃窜的史实不谋而合。由此说明，当时商人在北方尚有牢固的基础，幽燕之地成了他们最后的避难地。这股商人的残余势力，便是燕、蓟需要面对的又一股反对势力。所幸这些亡国者远没有畜牧族那样顽强，正如商文化因素在张家园上层文化中突然涌现又突然消失一样，他们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久就被姬周和蓟国大军荡平。

总之，经过上百年的艰苦奋战，到西周中期时，几大敌对势力该荡平的荡平，该剿灭的剿灭，该收服的收服，幽燕地区只剩下了一个终于站住脚的燕国和一个早已臣服于周的蓟国。看来此时应该天下太平了，但是，事情并未就此止步。

蓟的墓葬遗存已如第三章第四节所述，西周早期它仍延续着商文化遗风。蓟的居址目前尚未加以辨识，但学者注意到，张家园上层文化中“伴随主体文化因素的另一种文化因素以袋足鬲、簋、四系罐和极少量的灰陶簋为代表，明显地属于商文化系统。尤其是泥质灰陶簋的三角缘、器表折线划纹的形态与殷墟晚期至西周初期的簋完全相同”^②。这就是说，张家园上层文化并非单一的畜牧文化，还包括了其他类型的文化，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就是商系统的文化。这个商系统文化既有可能是商人残部的遗存，也有可能是蓟的文化遗存，因为在西周早期之时，蓟的文化仍然形同商文化，说已详第三章第四节。但到了西周中期，不仅商系统的文化在遗址中烟消云散，蓟的贵族墓也由觚、爵组合的商文化转变为鼎、簋组合的周文化，表明蓟国已完全从属于燕。此后再到西周中晚期之际，正如第三章第六节

① 《逸周书·作雒解》。

② 陈光：《北京市考古五十年》，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所述，蓟国从燕地消失，姬周燕国成了蓟邑的主人。

从西周初期到西周中晚期之际，姬周燕国先是击溃了畜牧族的主要势力和商人残部，继而荡平了畜牧族的残余势力，后又收服了蓟国，最终迁都于蓟。在这一步接一步的战略推进中，北京平原终成燕国的一统天下。

恐怕令全世界的史家都想象不到的是，姬周燕国这一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竟然谱写了一首人类文明史上极其壮伟的凯歌。

世界史泰斗、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公元前二千纪，欧亚大陆正处于一个骚动时期，即游牧民入侵、古老的帝国被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瓦解的时期。骚动是猛烈的，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此，公元前二千纪是古代文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过渡时期。”^①这就是说，从公元前 2000 年起，同样出于上章第四节所述全球性气候变化的缘故，新兴畜牧族在欧亚大草原迅猛崛起，给整个世界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荡。这些好勇斗狠的人们挥舞着弯弓剑戟，风卷残云般地四处征伐，欧亚大陆的各古老帝国在他们的屠刀下纷纷土崩瓦解，相继堕入历史的黑暗。当时闯进农耕世界的主要有印欧种人，他们的足迹东至印度河，西至爱琴海，中部至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此外还有闪米特人，进入了两河流域和埃及。这些人有马驾的双轮战车，稍后还使用了骑兵，整个战争过程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一千纪。

然而，就在这些新兴游牧族排山倒海般地倾覆整个欧亚大陆古代文明之际，在世界的东方，就在华北大平原北部边缘的燕山大地上，一支孤立无援的力量竟然抵御住了畜牧族凌厉的攻势，以“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的一己之力，保住了周朝的江山社稷，保住了华夏的农耕文明。可以说，正是由于燕国的浴血奋战，人类历史上才有了一个从未间断的文明，人类文明史上才有了一首没有被粗暴抹去的华彩乐章。从这个意义上讲，姬周

^①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第 149 页。

燕国对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可谓居功至伟，功不可没。

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想象燕国当时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了。特别是鉴于世界上那些强大的帝国在游牧族的践踏下竟是那样的不堪一击，就更难设想燕的处境是何等的凶险了。太史公司马迁对此也不得其详，只能笼而统之地说“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①。一句“几灭者数矣”，算是道尽了燕国的危如累卵和艰苦卓绝，也表明燕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是怎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拼死一搏的。燕国早期历史的一片空白，恰好说明当时周天子和中原列国对这场惨烈的生死搏斗未予援手，甚至坐视不救，以至在中原史官的典籍中只能阙而不载，乃至讳而不言。

作为死守农业文明最前线的诸侯国，燕国的华夏卫士使命几乎贯串了它的全部历史。即使到了战国中晚期，当周人的历史行将结束之时，燕国仍然承担着抵御北方强族的重任。当时北方最强大的是匈奴族，他们一再南侵，已经兵临燕、赵、秦城下，酿成了“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②的危机局面。可我们看到，燕国一则反守为攻，依靠贤将秦开“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把匈奴和东胡等游牧族向北驱赶了千余里；二则“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积极筑边以自保；三则考古资料证实，恰是在战国中晚期，燕人的墓葬向北延伸到了河北张家口、辽宁朝阳和内蒙古赤峰一带，最远到了沈阳^③，表明了燕国势力的北扩。众所周知，西方的秦国就是在战国中晚期崛起的，此后陆续翦灭了包括燕国在内的东方六国，建立起强大的秦帝国。但不难设想，当初如果没有燕国的这道铁血屏障，如果不是燕国全力以赴地阻挡住了北方的游牧族，同样处在匈奴刀锋之下的秦国岂

① 《史记·燕召公世家》。

② 《史记·匈奴列传》。

③ 郑君雷：《战国时期燕墓陶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3期。

有力量兼并东方六国？大一统的秦王朝又岂有可能创建？历史是不接受假设的，这些问题自然不会有答案。但可以给出答案的是，当燕国灭亡以后，北方游牧族的压力全部转嫁到新成立的秦王朝身上，以至秦始皇不得不发30万大军北击匈奴，更不得不发近50万工役修筑长城。而这样的劳师动众，正是导致秦朝很快灭亡的原因之一。

姬周燕国在北京地区的出现，其意义是相当大的，这不仅仅在于它阻挡住了正向中原步步紧逼的畜牧族，也不仅仅在于它扫荡了盘踞在北方的殷人势力，完成了今北京地区的统一，更突出的是，它还在各个方面对北京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甚至可以说，正是始于燕的突兀登场，终于蓟的黯然消失，北京地区的历史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首先，召公所封的燕，是幽燕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原王朝任命并派驻的地方政权，首开了北京地区直属中原王朝的先河。

周召公之前，甚至早在五帝时代，就有关于帝尧“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①的说法，即帝尧也曾派和叔部族来幽都镇抚各方。从黄帝曾经“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②的记载看，从帝舜曾经“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③的传说看，帝尧向幽都派遣部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此举当初或许也对幽燕各部产生了一定的控制和震慑作用。但受命的和叔并非一级行政组织，而相比之下，召公的燕国具有确切的名号、机构、法权、疆界及中心城邑，是不折不扣的一级政权，此即幽燕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原王朝正式册命派遣的、直属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

说燕国无异于当时的地方政权，是由西周分封制的性质所决定的。事

① 《尚书·尧典》。

② 《史记·五帝本纪》。

③ 《尚书·舜典》。